

毛泽东



人生
纪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中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中册目录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759
赫尔利的谈判与图谋	778
主持召开中共七大	794
指挥对日寇最后一战	823

交往

永恒的情谊——与贺龙	833
“我在延安，就是靠萧劲光吃饭”——与萧劲光	844
“创造的模范”——与王震	862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与丁玲	878
难得是诤友——与李鼎铭	891
同坐在一条木板上——与陈嘉庚	900
爱国情真 借图良晤——与卫立煌	910

珍闻

“老革命”也得依法论罪	926
张国焘叛逃	931
会见白求恩	935
带头开荒生产	940

《新民主主义论》的诞生	946
听到骂声之后	950
做枣园普通居民	956
当众赔礼道歉	962
黄炎培延安之行	967

第五编 指挥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1945—1949)

历程

重庆谈判	975
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012
撤离延安	1025
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1034
决战时刻	1042
指挥大决战	1049
将革命进行到底	1074

交往

“刘伯承打仗是有功的”——与刘伯承	1087
最难忘处是真情——与聂荣臻	1099
“你打仗越来越有瘾了”——与陈赓	1110
“你一仗比一仗打得好”——与粟裕	1118
神交已久——与张澜	1144
共谋国是缔友情——与李济深	1157
相知在危难 携手日同行——与冯玉祥	1167
相遇贵相知——与张治中	1176

“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与傅作义	1198
“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与程潜	1214

珍闻

深入虎穴	1225
送子学农	1231
“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1237
铸造人民的铜墙铁壁	1242
决战沙家店	1247
惜别陕北	1252
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大决战	1256
会见米高扬	1262
进京赶考	1267
打倒贾桂思想	1273
“风物长宜放眼量”	1277
也有“三怕”	1285
访故友	1292

第六编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949—1956)

历程

为新中国奠基	1299
建立地方政权	1310
整顿旧经济秩序	1328
出访苏联	1342
维护祖国主权	1383

抗美援朝	1394
土地改革	1409
镇压反革命分子	1417
发动“三反”、“五反”运动	1441
改造旧文化	1459
反对高饶	1480
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	1515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539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内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之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

的。许多知名的或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每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泽东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做“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做“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

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泽东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 1940 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泽东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

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著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泽东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烽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泽东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泽东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泽东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泽东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分别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

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间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泽东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泽东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泽东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泽东、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

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共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

高是同一工作的两个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泽东“引言”的响应,又为他 10 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 月 16 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泽东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泽东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泽东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德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还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

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德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泽东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